

S 012926

郭沫若批判



郭沫若批判

H. K. 9.50

1975年 9 月重印 1 版

著 者：馬彬

出版者：燎原出版社

九龍郵箱K-1276號

承印者：優美柯式印務

電話：3-939180

KM-51102 -2

目 錄

序論：「五、四」運動與郭沫若的崛起……………一

發端……………一

文學革命前夜的社會形態……………二

文學革命的本質……………六

郭沫若的崛起……………一〇

郭沫若的思想與生活……………一四

一、少年時代……………一四

二、生理缺陷的影響……………二七

三、留日初期……………四五

四、從醫生到詩人·····	五六
五、創造社時代·····	七二
六、北伐·····	九六
七、海外十年·····	一一〇
八、八年抗戰·····	一三五
九、從勝利到「解放」·····	一五七
十、結論·····	一七八
郭沫若的作品·····	一九一

一、詩·····	一九二
二、散文·····	二一〇
三、戲劇·····	二一七
四、歷史研究·····	二二八
總結·····	二四八

序論：「五、四」運動與郭沫若的崛起

發端

爲一個活潑的人寫評傳，本是極困難之事。在動亂的時勢中，人底變化正多，蓋棺尙不足以論定。何況因緣時會之士？在動筆寫本書之前，我曾躊躇甚久。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郭沫若是以反叛傳統的鬥士自居，中國共產黨人的統治中國，以郭氏的理論來說，應該是「叛逆」的成功。歷史上底革命家，武人在成功之後，勳業書之竹帛，富貴傳於子孫；文人在成功之後，類皆汲汲於內聖外王之道，爲統治階級建理論基礎，或被學術之華表，冀自身之歸正統；但是，郭沫若的事業，却不因「叛逆」成功而趨於輝煌。在過去四年之中，郭沫若竟終止了他的創作生涯，以中共政府顯達的身份，君臨中國的作家羣；以中共中國的文化偶像姿態，週旋於共產國際；一個自稱「叛逆」的作家在叛逆成功之後而轉入仕途，以揖恭爲事，不免令人生寂寞之感。何況，一個作家既經擱筆，就其創作生命來說，無異蓋棺，故亦無妨爲之論定矣。

於是，我覺得「郭沫若批判」一書，還是可以寫的；郭沫若這個名字和中國人的意念，是以「作家身份」作爲聯繫的；而郭沫若可以批判和值得批判的，也正是他保有作家身份那一段歲月，一旦進入紅色殿堂，其生榮或死哀，與中國人民均少有關係矣。誠然，郭沫若是善變的，今而後，雖然年迫衰暮，變化還是會有的；祇是一個弄臣之變，對人類社會不會再有影響，作爲作家，叛逆者，鬥士的郭沫若，到担任中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已走完他底生命的路程了。

郭沫若是在「五、四」運動狂濤奔騰之後始崛起於中國文壇的。「五、四」以前的中國，許多變革都未曾影響及他，這是郭沫若與他同時代的人，出身上顯著不同之處。「五、四」運動有兩種發展，一是對傳統的破壞，一是對未來的建設；郭沫若的思想，承受了對「傳統的破壞」這一面。因此，當中共的叛逆獲得成功，而他亦繼魯迅爲中共文化的領導人時，「破壞」的傳統不適用。「建設」又不會在他心中生根。再者，郭沫若承受破壞的思想，亦屬乘時之舉，用新名詞來說，機會主義是也。

雖然，一個機會主義的成功，亦自有其時代與社會背景，在批判郭沫若的思想生活與創作之前，我們應先弄清楚郭氏出身的社會背景與陪襯他的時代，還在瞭解上是有其必要的。

文學革命前夜的社會形態

中國近代史上的社會變遷，始於十九世紀末年，形成於二十世紀之初；中華民族是挑着庚子八國聯

軍的重組踰進二十世紀的，傳統的思想與制度，被戊戌（一八九八），庚子（一九〇〇）兩大事事件所搖撼，西洋的學術思想湧進了中國的大門，產生變革的要求和行動。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所以能獲得成功，是因於舊的統治權經「戊戌」、「庚子」的搖撼而失去其控制力量。於是，革命行動一開始，星火燎原，就無可遏制了。

辛亥革命的思想領導是「戊戌變政」，但是，兩者之間却有着本質的差異：

「戊戌」事件僅是士大夫階級爲本階級自救自存而要求的政治體制的改革，缺少民族意識而又和羣衆利益脫節的；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與產業革命相呼應，而中國的戊戌政變却架空而來，當時縱無那拉氏的阻撓，以後也必歸失敗，結局或者還要悲慘；不過，「戊戌」的失敗，却啓發了普遍的革命心，其對後來的革命，亦有着好與壞的雙重影響。好的方面，「戊戌」打破了封建皇朝的大門；壞的方面，是「戊戌」領導人物的機會主義色彩，曾使若干繼起的革命者走入了歧途。

「戊戌」政變的領導人康有爲和附從他的如梁啟超等人，在變法之初，對政治的認識是膚淺的，僅祇空洞的理想而又急於事功，但康梁無疑是代表了當時進步的知識份子。由於他們的身份限制了他們對國民利益的認識，忽畧了在列強宰割下中國人民的真正要求是本質的改變；乃開出溫和的藥劑來治療急症。

「戊戌變政」的方式，是祇適宜在昇平之世的，如果「戊戌」諸人的理論出現在滿清皇朝統治基礎未崩解之前，是可以獲得成功而造福後世的，但時至十九世紀之末，固無能爲功矣；「戊戌」的重點在於「變法」，康有爲的奏議中有云：

「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統一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登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爲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爲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祖宗之初意哉！」

在這一種觀念下所產生的新政，是由官制的改變來實行新政，非因新政設施而興革法度官制，在出發點上，還是不够準確的。

由於倡議變法者爲士大夫階級出身的康梁等人，他們在變政的過程中，對於教育方面特別着重，其改革頗有可觀之處，史家稱爲「維新時期的教育」。現述其要點如下：

1. 設立學部；2. 頒佈學堂章程；3. 設立京師大學堂，各省府州縣，籌設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4. 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八股文四書文律詩律賦小楷，改試策論；5. 整頓翰林院，課編撰以上各官以政治學等；6. 命各省選派學生，往外國留學；7. 設立武備學堂；8. 變通武科，廢止弓刀石，改試槍砲。

上述教育措施，是善的，「戊戌」的成就，也在於此。直到民國以後，教育措施，仍有不少沿用。戊戌政變不久即失敗，但是，近世社會思想，却因此而逐漸不變。十餘年後，辛亥革命起矣！

「戊戌」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明瞭了局部的改變已不足以挽救危亡，且亦無成功的可能，民心的息變已不止於皇帝下罪己詔和減削皇帝的權力；而是從根本上撤消帝制。「戊戌」以溫和的改革而失

敗，「戊戌」的繼承者便改採激烈的手段而獲得成功。

辛亥革命是大刀濶斧的，有政治的口號而無政治的具體理論，在革命行動開始時，革命的理論本來也不被注意的，求變者祇求得一原則性的口號以爲行動的依據，並無細究理論之暇。「戊戌」以理論爲導，「辛亥」則以行動爲前驅。此爲兩者顯著不同之處。

從戊戌（一八九八）到辛亥（一九一一）那些年中，中國社會的變化是極大的。外力的侵襲日甚一日，而在滿清皇朝的內部，則反動保守的勢力與維新改良的觀念相激衝，人民生活在密雲季的苦悶中，民怨沸騰並非由民不聊生所激起，而是由國家觀念所促成。由於外患頻仍而提高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再由國家觀念而萌生民族意識的鬥爭，在滿清統治的三百年間，漢民族的民族意識本來是相當低沉了，太平天國的覆亡，便是因民族意識不夠強烈而失敗的，但是，辛亥革命得到外在形勢的鼓蕩，死去了的民族意識因國家的危亡而復活，於是，民族革命的口號得到普遍的響應。孫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口號，其次序的編列，是極切合當時的情勢的。

「辛亥革命」以內外形勢的有利而獲得迅速的成功。但是，辛亥的成功祇是形式上的，中國社會的本質並未因革命而發生根本的變化。

「戊戌」政變以在開始時就沒有澈底的革命精神而失敗，辛亥革命以無力澈底地完成革命的任務而導致以後的軍閥混戰的局面。

「辛亥」之後，中國在形式上是變了，但社會內層却仍在曖昧之中；且因軍閥的事權而愈陷於混

亂。革命的勢力僅在南方有一個弱小的基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舊時代的沉渣不斷地泛起。使中國的知識份子悟解到單是形式的改變無濟於事，必須要實質上的變化，使中國能真正進入新的時代。

所謂根本變化是應從思想上出發的，「戊戌」是具有思想改革的形態而無此決心與缺少實行的環境。但在「戊戌」之後，不少人即埋頭於思想改革的初步工作。梁啟超的「新小說」即其一端；而周桂笙，徐念慈等人在翻譯外國作品的努力，與吳沃堯的創作生活，對中國文學改革，均有開路之功用。雖然上述三人亦導致「買辦」文學之弊，然而，啓蒙期之功，固不可沒也。

從戊戌（一八九八）開始了思想的不變，經過二十年的醞釀與一次大革命的成功，社會上對於思想革命已經有了相當的準備，加以時局的發展，求變圖存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於是，「五、四」運動遂如狂潮澎湃，成為近代史上一支革命的主流。

有了「戊戌變政」的啓示，才導致「辛亥革命」；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才使「五、四」運動能够興起文學革命的成功，是由辛亥革命先創造了一個環境。否則，「五、四」必如「戊戌」那樣，終歸煙消灰滅的，這點，胡適、陳獨秀二氏均加予承認。

文學革命的本質

「五、四」運動的萌芽，是由胡適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而起，那篇文章刊於民國六年一月一日

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五期上。胡適提出了下面八點：

- 一、須言之有物，
- 二、不摹仿古人，
- 三、須講求文法，
-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 五、務去爛調套話，
- 六、不用典，
- 七、不講對仗，
- 八、不避俗字俗語。

上舉八項，初看似純從技術上着眼，但所包含的意義，是深廣的，是對傳統的革命，是以新建設來革舊的命。於是，陳獨秀氏繼而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曰：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在萌芽季的文學革命的理想，便包括在上面的八項與三大主義之中。我要強調指出：文學革命一開

始終然是對傳統的破壞，但同時也有建設，即破壞是一面，建設亦是一面，並行而不悖。

「文學改良芻議」發展成「五、四」運動時，已經不單是文學上的要求了，此亦有其必然性，或有喻「文學革命」爲人底覺醒者，然則覺醒的人會有各方面之要求，是自然的趨勢。

文學革命轉化爲宏大的愛國運動，是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發動大遊行，要求北洋政府收回山東權益，廢除二十一條及懲辦賣國賊等。

在此一時期，「五、四」的鬥士們提出了改革政治的要求，那是科學與民主。此即「五、四」的重點，當時稱民主爲德先生（Democracy），科學爲賽先生（Science）。「五、四」的政治改革主張是以法國的「人權宣言」作藍本，以英美政治制度爲榜樣，陳獨秀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明白地舉出：

「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陳獨秀文存 三七六頁）

其次，胡適更具體地提出他的主張：

「文明不是範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範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

「我們因爲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良，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

因爲這是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均見胡適文存）

上面所引的那幾段，已可簡單地說明「五、四」運動的精神，扼要地來說，「五、四」是建設性的破壞，是提倡科學，是尊崇英美式的民主精神。

但是，到了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他們強姦了「五、四精神」，使「五、四」運動的本質與發展，起了變化。

「五、四」初期，共產黨人李大釗曾經提出了「主義」，但未受到重視；胡適曾經駁他，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共產主義在最初進入中國時，正遇上「五、四」波濤洶湧之際，並未發生大作用。但是，「五、四」的第一個高潮過去之後，亦即破壞之後着重建設之際，共產黨滲入了！他們以更大的煽動與更大的破壞來衝激，來改變「五、四」的方向。

於是，「五、四」運動開始變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得意地說：

「『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二七』大罷工），均在世界第一次大戰與十月革命之後。」

這是對「五、四」精神底毀損，是無恥的劫奪。但從毛澤東之言，也可以襯出「五、四」本質的改變，由科學民主轉到布爾什維克的破壞之路。

「五、四」運動本質的被改變，在中國是造成悲劇的：辛亥革命激起「五、四」運動要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被損壞，致使北伐的主題，不能純正地建立在民主之革命上面，亦因而導使以後長久的災難與普遍的「不幸」。今天回想起來，中國近代史上的幾次變革，皆由領導中心的軟弱而致功敗垂成。

然而，郭沫若却因緣於「五、四」本質改變之時會而崛起。

郭沫若的崛起

從「戊戌」到「五、四」，中國的改革行動，在精神上是有其共同之處。因此，不了解「戊戌」，便無從認識「辛亥」及「五、四」。

但是，郭沫若對「戊戌」是昏然無知的；對「辛亥」，膜不相關而又有意識上的錯覺；他的文學活動是「五、四」餘波所啓發的，而影響他的政治意識則是變了質的「五、四」精神。

郭沫若開始新詩創作是在民國八年的下半年。他並非受「新青年」的影響，而是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上看到康白情送朋友的詩而做效着寫的。這一個時期，「五、四」精神正在高潮之際，但是，到民國十年，中共成立之後，「五、四」的變質便明顯了。

郭沫若在中國文壇露面是民國八年的秋冬之交，在中國文壇開始活動却在民國十年之後。當他出現於中國文壇而看得清左右形勢時，「五、四」的高潮已經過去，代之而興的是左傾的想思——但在民國

九年到十年，左傾思想還未到狂熱的程度。不過，在趨向方面，却可以看得出共產主義將代科學與民主而成爲主流。

郭沫若從日本初到上海所接觸到是以商務印書館爲基礎的「文學研究會」人物，而其領導者多爲「五、四」運動中成名之士。此時他們雖已缺少「五、四」當年的鋒芒，但社會地位則已相當鞏固。郭沫若在此時要由正道登場，是相當吃力的，而且也少有大成功的希望。

因此，郭沫若在接觸了當時形勢之後，採取了走捷徑登龍之術。

「五、四」運動破壞的一面，在陳獨秀、胡適甚至周樹人那一羣人，已不再去鼓舞激盪了的，然而，新在中國成立的共產黨，却全力從事於擴大破壞面的工作。

就運動的本身來說，「五、四」是僅祇局部的成功，即白話文與戀愛自由而已。政治上的建設，見功本極緩慢，何況，當時的北方，軍閥勢力相當雄厚，政治改革，原非一朝一夕所能竟功。然苦悶中的人羣，對緩慢的建設工作，頗有河清難俟之概。在北方——當時政治中心——有一部人憧憬於南方的革命黨，另外一部份人則嚮往於吳佩孚之流的土產英雄主義；科學和民主轟轟烈烈了一陣之後，不久也就變成缺少刺激的東西。青年人在苦悶中找到了共產主義，因爲它新鮮，刺激。

「五、四」運動最响亮的口號是破壞性的，這是郭沫若看得很清楚的。最引人注意的也是破壞性行爲，逃婚，反抗家庭，叫罵孔丘。都成爲極時髦的行爲，於是，他選擇了破壞性的——破壞「五、四」所建立的東西，從而否定「五、四」的領導，以新的破壞來建立自己的偶像地位及打倒原有的偶

儼。

爲着要從破壞這一面着手，於是，他選擇了共產黨人所走的路。再者，在民國十一年間，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很新鮮的，它的理論少有人理解，因之，信口叫口號，也會有人注意及重視。

郭沫若沒有政治信念，亦不瞭解近代史的變革路線，他睜開眼來看到的世局，是「五、四」破壞成功的一面，及建設前途的黯淡面；破壞的理論是比較容易懂的，建設的理論，則必須有根基始能領畧。郭沫若沒有根基，他在思想上是機會主義者，唯一的慾望是希圖獲得個人的成功。

機主會議者處事毋須理論，祇要看清外在的風向氣色足矣。此爲郭沫若以悖逆者姿態出現的始因。「五、四」的領導份子，在民國十年之後，多數由激烈而轉趨溫和了。胡適之已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號，作爲新文學運動中心重鎮的「文學研究會」，亦以溫和的面貌與世人見面。當年銳利的鋒芒，已日就消斂，此爲由破壞轉入建設的必然現象；然而，中國青年的政治苦悶絕未解除，刺激的需要仍是強烈的。因此，郭沫若等人闖入文壇的戰畧是擴大和加深破壞面。戰術是樂而淫，哀而怨！使漸就平靜的江河再掀起波濤。

這種出發點是自私的，是不顧全中國大局的。但是，郭沫若爲了要使自己嶄露頭角，也就不顧計對國家是否有利。如果郭沫若對「五、四」的本質能有深入的認識，那末，他是不會走上擴大破壞之路的。

創造社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固然有其地位，但此僅就創造社若干成員之作品而言，至於他們的集

國，在文學活動上 是無功益可言的。他們所造成的就是一種混亂，而不會爲未來的建設打下基石。

「五、四」運動建設性的一面被抹煞之後，一直就不會再抬起頭來。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治局勢之長久動亂不安——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扼殺了民主的幼芽；國共分裂之後的長期內戰與日本侵略，又使中國無法從事於真正的物質建設。——另外一方面，文學上的破壞與頹廢傾向的造成，則創造社不能辭其咎。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與「戊戌」，「辛亥」鼎足而三的大事，是中國人覺醒的真正開始。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竊據這一光輝的運動，抹煞了它科學與民主底本質而蒙上共產獨裁的外衣，這是對「五、四」的一種深重的毀壞！而在「五、四」運動以後崛起的中國作家郭沫若，則是歪曲和毀壞「五、四」神聖理想之主要一人。